

中央宣傳部叢書



# 和 與 戰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279368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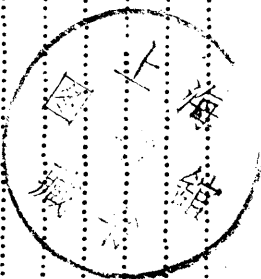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5 5864B

# 和與戰

## 目錄

引言·····	汪精衛
答問(二)·····	胡蘭成
和與戰·····	曾資深
和平戰爭與中國的統一·····	金效胥
從「抗戰」到「主和」·····	中華日報社評
關於和戰問題的言行心理·····	中華日報社評
從抗戰建國到和平建國·····	中國公論社論
論和戰·····	中國公論社論



# 引言

汪主席說：「當初以爲日本要滅亡中國的，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滅亡中國，而是要與中國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榮，所以要謀和平之實現。」「當時如果不抗戰，國民黨無以對國民，現在如果不講和，國民黨也無以對國民。」的確！應當戰的時候戰，應當和的時候和，和與戰的決擇，就得看國家民族的需要；國家民族的需要是生存獨立的保衛，戰而可達到此目的，則應主動的戰；和而可達此目的，則應主動的和。主持國家行政的政府當局，既然賦有宣戰媾和的大權，那便應該當機立斷，決定「和」「戰」的大計。

回顧我們中國，當初果然爲了維護國家獨立生存，不能不抗戰，但到了近衛聲明以後，明白日本的态度，是並不要滅亡中國，而是要與中國共同防共合

作，事實上已無礙於中國的獨立生存，已可完成抗戰的使命，就該把握這良好時機，尋求和平的途徑，方才是真正為國家民族着想；然而被共產黨劫持的重慶政府，已失去了它的自由權力，竟拖泥帶水的濫戰，要和而不敢言和，以致淪陷的地區，日漸擴大，國家民族的危機，日益增加，將使數千年的古國，陷於滅亡的絕境！

汪主席針對着時局，發表豔電主張和平，在戰的動機已經消失的現在，是很必要的，很自然的，適合國家民族的要求。我們全國民衆，既然明瞭為國家民族獨立生存與挽救危亡，現在已到了不應該戰而應該和的階段，我們便應勇敢的努力的一致參加救國的和平運動！

## 答問（二）

汪精衛

本月九日，發表『怎樣實現和平』之後，接到了許多來信，曾經對於其中的一個疑問，予以解答，現在再解答另一個疑問。

這疑問的大意是說：『兩國由戰而和本是常事，但當初爲什麼戰？如今爲什麼和？這其間是否有一貫的理論，而不致使人陷於思想上的矛盾？』

我的解答是，當初以爲日本是要滅亡中國的，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滅亡中國，而是要與中國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榮的，所以謀和平之實現。

當初以爲日本要滅亡中國，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最高目的自然想救中國於滅亡，最低限度不能救國，亦可殉國。如果當初的抗戰是由於這種純粹的不得已的動機，那麼，在今日必然以當初一樣的誠心誠意來謀和平之實現；因爲

只要能使中國不致滅亡，則最高目的已達，當初的戰，今日的和。完全是一貫的，沒有一些矛盾。

反之，當初的抗戰不是由於這種純粹的不得已的動機，或是由於個人的利害，或是由於第三國際的命令；那麼，個人的利害問題未得解決以前，第三國際的命令未有更改以前，自然只好不顧一切的主張抗戰到底。這也是一貫的，並沒有矛盾的，所差的不是爲中國着想，是爲自己個人或第三國際着想。

來信曾舉出我在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所演講的『最後關頭』來做個例，這個例好極了，全篇文字是因爲眼見得日本是要滅亡中國了，既然不得已而出於戰，因戰之故，雖人與地皆成灰燼，亦所不辭。全篇文字其意義是如此的，所以對於不戰而使人與地皆成灰燼，不能不深惡痛絕。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所演講的『如何使用民力』，一月二十三日所演講的『抗戰期間我們所要注意的三要點』，十一月十二日所演講的『如何培養我們的勇氣』，十一月二十三日所演講的『爲什麼誤解焦土抗戰』，十一月二十四日所演講的『全面戰』

爭』，及同日演講的『犧牲的代價』，皆一一可以覆按，並沒有一些矛盾。

至於豔電發表，是因為日本已經提出和平條件了，已經可以證明日本不是要滅亡中國，而是要與中國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榮了；那麼當初不得已而出於戰的動機已經消失，棄戰言和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我在覆華僑某君書內說：『我們應該拿出抗戰的決心勇氣來講和』，就是這個理由。

在抗戰期間，我們同志，與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是因為我們在抗戰開始以前，總是想盡方法來避免這場戰爭；及至不得已而出於戰，則又想盡方法不使和平的門終於關閉。我們不問方式，只問條件。只要條件無害於中國之獨立生存，則隨時準備討論，準備接受。這是我們同志與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這種決心由於不忍中國之滅亡而來的，我們的思想始終一貫，並沒有一些矛盾。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 和與戰

胡蘭成

這次中日戰爭有幾個可能的前途：其一是中國勝日本敗，其二是日本勝中國敗，其三是中國敗日本未必勝，其四是日本敗中國未必勝。而無論如何，其結局總之是「和」。

因爲這戰爭不僅僅是中日兩國勢力的較量，而是牽涉到國際諸勢力的錯綜運動的。從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英美德意等國並不是加入中國這一邊或者加入日本那一邊，她們始終是第三者，雖然這一羣第三者自身包含着幾種正反的因素，對於中日戰爭所取觀點，不但英美與德意有其分歧，即英與美，德與意亦有其分歧；然而她們統統是第三者，第三者所關心的不是中日的或勝或敗，而是各以一己的利害爲前提來攷慮中日戰局，使之適合分量的。她們不希望一方面大獲全勝，因爲不管那一方面大獲全勝，第三者都生怕失去她們舉足輕重的

地位，使得她們不容易在這上頭打主意。所以，她們總是願意即使一方敗，別方未必勝，以爲從中支配均勢的餘地。由於這種主觀上的算盤，再加上客觀種種的顧忌和牽制，他們不但不利於讓日本大獲全勝，而且援助中國，使之大獲全勝，事實上也有所不能。

德意對於中日戰爭，沒有像英美那樣大的企圖與決心。在開始的時候，德意的要求不能有具體的輪廓，防共同盟久久不能確定它的真實對象，她們只企圖在貿易上向中日雙方討點便宜。等到後來，防共同盟確定了它的對象爲蘇聯，德國要想更進一步利用日本的時候，却又遇到了一層不可逾越的困難，即德國缺乏直接對遠東行使其影響的條件。能夠對遠東直接行使其影響者爲英美。因此我們應該特別認清英美對這件事的旨趣。

英美就不希望中國或日本任何一方大獲全勝。她們的設計雖然互有出入，但在開始的時候，她們都以爲中國失敗，却又不願日本得到她的勝果。到了現在，她們都願意日本失敗，却又不能幫助中國得到她的勝果。英美在這件事上

的分歧與合作，變化萬端，但始終沒有離棄過這個根本方針。在先英美分歧的時候，英國並沒有加入中國這一邊打過日本去，美國也沒有加入日本這一邊打過中國來。在後英美合作的時候，她們也沒有共同加入那一邊。她們始終是第三者。爲了保持第三者的地位，她們祇是隔岸觀火，視若無覩，他們終於逃避了對日行使經濟制裁。她們要使中日任何一邊在這場戰爭裏都不能有太多獲得，好讓第三者對於戰果有參預的機會。

於是就變成這樣的局面：中國和日本在一邊打，英美法在一邊看。這麼一來，不但中國的抗戰會被從民族解放獨立的革命戰爭拉開，而成爲殖民地次殖民地再分割戰爭的工具，即日本也做了人家的傀儡，由主動降爲被動。在先日本秉其戰勝的自信，曾經極力想保持其主動的地位，聲言不受第三者干涉，然而終于不能從做成的圈套中掙扎出來，不得不到處扣別人的門戶，伺候顏色。這已經是一個悲劇中國呢，有些人對於英美的靜觀，在先不免憤憤然，現在則又高興起來，以爲得到了幫手。然而我們所要指出的是，今時英美之支持

中國，亦猶昔時英美之容忍日本，日本曾經充分利用英美的容忍，中國自然也可以而且應當充分利用英美的支持。不過，比一切都更重要的是，必須認清主客之分；我們是主體，而周圍的條件則不過是客體。我們戰，不是人家所希望的戰；我們和，也不是人家所安排好的和。我們必須爭取主動的地位。我們不是爲要變動列強相互間的均勢而戰，也不是爲要重新安排這種均勢而和。至於蘇聯的外交界企圖如何攢入這種均勢並利用之以爲蘇聯安全的保證，這也不是我們的事，我們不能爲了適合蘇聯外交界的這種口味而隨人俛仰。我們是爲了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生存，並以此呼喚全世界被壓迫者的正義。認定了這一點，那麼，我們能戰，能和；否則，不能和，並不能戰。

廣州及武漢失陷之後，在中國與日本都是一個生死關頭。其在日本，軍事的攻勢已遭停滯，即企圖以繼續的軍事刺激作爲打開對英美外交的手段已不再適用。而且，明興協定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到已近在眉睫，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以德蘇爲核心，也越來越明顯。這使日本不得不改變時間的安排，並且重

新考慮自己所處的地理位置；日本原來一手支配中國經濟以作成「中日經濟集團」的計劃，就不能不改變，因為和英美交涉獨佔，要耐得煩，耐得等待；獨佔即使到了手，也需要行使三年計劃或五年計劃，纔能得到某種結果。然而現在就是在時間上不許可她這樣做。爲要追趕時間，這次近衛的聲明在經濟方面，對英美減低了條件，希望以這種讓步去獲得迅速解決。這是一樁可注意的事實。再則，二次大戰果以德蘇爲核心，則在這一幅新的世界地圖上，美國將更被拉近戰場，而日本則將處在類似上次大戰時土耳其的位置。她被夾在中間，只有和中國可以結成友好關係以爲保障。因此，這次近衛的聲明儘可能的向中國減低了條件，回復到戰前以廣田三原則爲談判之基礎。這又是一樁可注意的事實。

其在中國，廣州及武漢失陷之後，戰事即呈膠着。此種膠着，其爲利爲弊，正自難言。引敵深入，終收反攻之效，在歷史上不是沒有過這種例子。不過拿破崙征俄之役，已經隔得太遠，物質環境，今非昔比。至於蘇俄在一九一

九年前後如何驅逐列強的武裝干涉出境，不是中國今日的情形可比。第三國際現在替我們設計，却是要我們採取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辦法，然而這只是拿別人的流血開玩笑而已。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反攻在那裏？中國這次自抗戰開始到現在，始終沒有拒絕過和日本談判，從九國公約會議的調停，德國大使的調停，一直到英國大使的調停，前者見之報章，後者則聞之駐美大使胡適的演講。此皆蔣介石身親其事者。中國經過一年多創鉅痛深的血戰之後，假使能恢復其蘆溝橋事變以前之地位，而領土主權的獨立完整得以確保，則抗戰之目的已達。我們從國民黨臨全大會的宣言，以及見之于事實的一貫政策來看，都可以瞭解這一點。既然如此，我們的希望就只能是要謀和平解決，也必須爭取主動的地位。

這裏所謂爭取主動地位，就是說在交涉或調停之際。中國也應當有她自己的方針，也就是說中國應當主動的選擇時機。否則，老是一成不變的僵持下去，只給予別人一邊講價的機會，等到人家做好了圈套纔叫苦連天，不但中

國人民都做了阿斗，連中國政府也做了阿斗，讓別人在那裏做我們的諸葛亮，來決定我們的命運。那時候，則戰固沒精打采，和更莫名其妙。

汪先生的豔電，即是要我們極力爭取外交的主動地位，主動的選擇和平解決的時機，這比之那些只知狂喊，結果弄到由被動的戰而終於被動的和，而失去一切選擇的自由者，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今日之事，不僅是中日之間此損則彼益，損益的計算還應該把中日與第三者之間打一面總算盤。如此，我們就不難瞭解汪先生所建議，果日本確有誠意，則本於先生遵照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針對近衛宣言而提出之諸點，可作為談判之基礎，以及倫敦泰晤士報所說，近衛聲明的條件已較過去為和緩，實有其準確性。

（轉載香港南華日報社論）

# 和平戰爭與中國的統一

曾資深

很顯然的，在中日戰爭未發生以前，中國的內部有一個重大的矛盾，這矛盾造成中國不想抗日而終於抗日想半途言和而終於不能言和的局面。

事實是這樣的：當時中國的內部形勢，是一方面趨向於統一而同時也包含着地方軍事政治離心勢力的存在。中央蔣的勢力龐大了，地方性的軍事政治勢力感到危殆，於是趁華北中日軍橫恣之時，高揭抗日倒蔣或抗日必先倒蔣的旗幟，這是一段；西安事變後，蔣被劫持而趨向抗日，這時由抗日倒蔣變成擁蔣抗日，這又是一段，但無論抗日必先倒蔣也好，或擁蔣抗日也好，在地方性的軍事政治勢力者的立場看來，借抗日之名自力倒蔣與引起日本軍事進攻外力消滅蔣的勢力以便私圖，其目的初無二致，其在蔣的方面，則為維持自己與軍事勢力政治地位起見，也需要抗日的招牌來穩定其控制的權力，地方軍事政治勢



力固然想藉抗日來倒蔣，蔣也正企圖挾中央用抗日來消滅地方勢力。在這樣的一個矛盾之上，抗日的聲調響亮了，一個說抗日，一個便加上到底；一個說犧牲，一個便言焦土，結果是欲和不和，不打也打，拖泥帶水，以迄今茲。至於當時對於國家民族的實現地位怎樣國家的經濟財政情形怎樣與國家的國防軍事政治是否可以應付一個強鄰的這一類問題，都不經心，縱有明白知道的，但因為有上述的矛盾存在，結果也只好不顧及了。

戰爭——尤其是國與國的戰爭是何等重大的事情！牠可以滅族，可以喪邦，可使數十年的建設毀於一旦，且可使千萬人民亡於一朝；不就國家的民族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的實質及其所處地位來作估量，只憑上述矛盾的一些動機發動戰爭，使建國的大業，半途而廢，這不能不使老成深識的人們，痛心疾首！如果另一事實是這樣；和平不能獲致，戰固亡，和亦不能不亡的時候，那麼即使我們主張和平的人亦不能轉向抗戰而認為與和平而亡不如抗戰而死，但現在客觀的環境轉變了，兩年來的抗戰成績，使日本覺悟武力侵略之非

計，而殷切地盼望中日和平，中國朝野人士在這時便應加以深重的考慮。

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民族，牠的唯一國策，是和平建設。和平可能時，是竭力的維持和平以保障建設。和平萬分不能保持而必須出以戰爭抵抗時，牠的性質也決非侵略性的，仍是以戰爭來恢復和平確保以後的建設爲目的，這是總理畢生所倡導的政策，這和平建國的精神，可以說是貫徹三民主義與總理思想的全部，現在抗戰的結果，已經促起日本的覺悟，據日本當局的聲明與客觀環境來看，和平已可獲致，而且領土主權也可保持，那末根據次殖民地的客觀需要與總理和平救國的主張，我們應以抗戰的精神和魄力來爭取光榮的和平，因爲只有這樣，纔能以和平建設代替戰爭破壞，才能使次殖民地的復興機運在和平保障之下再度的孕育滋長。

和平與抗戰的本身並無所謂是非的，主張和平的與堅持抗戰的，只有就中國民族國家所處的國際地位內部社會經濟政治的實質才能判斷他們的正確與否，一說到主和，便是漢奸；一說到抗戰，便是志士，這如果是不劫持抗戰以

便私圖者的說話，那實在一個缺乏政治訓練的浮燥意氣的民族缺點。這缺點如果不糾正，仍然是國家民族的隱憂。因爲在這種氣氛之中，老成謀國有先見之明的政治家，常常得不到羣衆的擁護，甚至於不敢開口，而一班意氣沒有爲理智駕御的浮燥之徒，反能一唱百和，貽誤國事、迄至濁流滔滔大錯已成之後，纔能省悟，甚至至此猶不省悟，然而國家民族的元氣生機，卽在這遲遲省悟或永不省悟的人們手裏斷送了，平心靜氣的說；這次中日戰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居心挑撥，人民陣線派的無知狂吠，及其他方面輕燥意氣的喧嘩，汪先生的主張老早可以實現，而蔣先生也並不會被迫而必須發動戰爭的。現在已經水落石出了，鐵一般的事實將無情的打擊這一班有意的無意的輕燥禍國之徒與自號爲民族國家的前衛的淺薄份子，同時鐵一般的事實，也將訓示我們忠實勇敢的同胞以一條正確的道路：卽是要將意氣熱情寓於理智之中，要將輕燥浮淺控制於深沉果毅之下。近代國民公民的私的行爲標準應該如此，而對於國家民族大事參與尤應如此！如果同胞對自己對國家民族達到了這個行爲的實踐標準的時

候，那末我們的國家民族現在雖給殘破，然而復興重建的希望正猶春氣之蓬然，我們無須乎悲觀與頹喪！

於此，有一問題，應揭發於愛國同胞和有識的朝野人士之前的，即是和平戰爭與中國統一問題。

如本文開始所說的，這次中日戰爭主要的內在原因，是統一勢力與離心勢力的矛盾衝突，假使真的統一了，這次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第一是蔣先生不需要對外強硬來維繫內部，很可能的與日妥協和平，以保障未完成的建國偉業。其次是日本知道中國真正有了統一，也決不會貿然無忌地進逼。東亞的和平仍可保持，中日兩國也不會掉入互相破壞與捏杌不安的深淵裏去。所以統一之於和平與戰爭，實具不可分割的聯繫。

更進，我們對於今後的統一與和平戰爭之於中國前途，具無窮的關切，因為這是中國以後興亡盛衰的樞紐，在此我要虔敬地加以分割，以貢獻於國民之前。

第一，我們要問；假定繼續抗戰下去，將來于「到底」了之後，統一至於中國，是不是可以保持一個健全的實體呢？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統一往往是以某一內在的外在的勢力爲中心而漸次發展的。嬴秦西漢的統一是以關中漢中爲基礎的勢力成功的，光武的統一是以南陽與其他各地的大族勢力河西的經濟基礎發展出來的。司馬氏的統一承借曹魏勢力由大族支持起來的。而元清的統一，却是由于一個強大的外來民族勢力的結果。我們承認：蔣先生的勢力是現代中國一個可資統一的中心勢力，但不幸他自己把牠斲喪了。由於容忍共產黨，使她可以自由發展紅軍與蘇維埃的勢力，這便相對地減弱自己的勢力，由于不顧一切地延長抗日戰爭，耗費國力己力，這便直接地戕賊統一的力量。所以將來「到底」了之後，國家殘破了，元氣喪盡了，可資以統一的中心力量沒有了，剩下的是斷瓦頽垣破磚敗井！是豆腐干塊式的零殘的軍事政治分割！是散匪流寇的到處奔流，是遍野的哀鴻呼號！落後的中國，迎頭趕上，終究還要掉到後頭，這樣一來，中國的進步便要倒退數十百年，將來憑藉什麼機運來復

興？憑藉什麼基礎可以產生一個真正的統一？我們只好茫茫問天！如果再憑理智來考察一下的時候，恐怕縱使拖到日本失去使中國殖民地化的力量，甚至整個崩潰，而中國自身仍不免要陷於第三國的附庸和殖民地的悲慘命運。

所以繼續抗戰的前途，是客觀地存在着這許多對於統一建設大業的危險。我不能丟開民族國家的前提，我便只能如此立論，我不怕人家加我以「民族失敗主義者」的徽號，我便要虔誠客觀地指出這些事實！

這是繼續抗戰與國家統一的利害關係的方面。

反過來，再看和平與統一的前途又有怎樣利害的依繫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一個次殖民地地位的國家，固然客觀現實需要和平，但要實際尋求和平，使和平能保障建設，却正如支持戰爭一樣，是一件艱苦偉大的事業。只有淺識者流才能一見提倡和平，便加之以巫覡式的咀咒，只有浮燥者流，才能一見主和之士，便加之以漢奸國賊的稱號，我們如果揭除這些庸俗的梁山泊好漢式的思想，就國家民族的前途，社會經濟軍事政治的現實狀況來

決定和戰大計時，我將浮白而呼，竭聲而叫：只有和平，可以保障建設，也只有和平，才可以使統一偉業，走上了一條正確實在的大道；這理由極其明白而簡單：

第一：取得和平，保存已有的國家元氣和力量，使得維繫統一，從事建設，以挽救次殖民地的命運。

第二：就國際的形勢日本的态度來看，現在我們可以求取光榮的公允的和平，就國內形勢看，我們還有本錢或力量，可以求致這種和平。

在這裏我要嚴格地指出一件危機和一班的錯誤心理。因為就真實的輿論來看，和平之有利于國家民族的前途是無疑問的了。和平之應該尋求也是無疑問了，但卻產生了一個誰來主和的說法。於是一張之洞不配議和，李鴻章才配議和的各種謬論出來了。實在這謬論的背後，正藏着一個個人地位和權利之爭。抗戰的起來，是內部勢力矛盾衝突的結果，抗戰的結果，仍然又是這一套，言念前途，不寒而慄！

其·實·和·平·既·無·可·疑·義·的·當·前·救·國·之·道·，·決·不·應·以·議·和·的·主·體·問·題·又·來·掩·護·着·一·個·內·部·政·治·權·力·的·鬥·爭·，·而·且·事·實·很·明·白·，·實·際·上·已·經·領·導·一·個·壯·烈·抗·日·戰·爭·的·是·蔣·先·生·能·領·導·一·個·光·榮·有·利·的·和·平·的·運·動·是·汪·先·生·，·他·們·個·人·的·政·治·意·見·容·或·對·立·，·但·我·們·如·就·國·家·民·族·利·益·來·看·，·蔣·先·生·的·抗·日·適·足·以·為·汪·先·生·求·得·光·榮·有·利·的·和·平·的·張·本·，·而·汪·先·生·光·榮·有·利·的·和·平·獲·得·，·正·所·以·保·障·抗·日·的·成·果·而·使·國·家·民·族·得·到·復·興·。·更·就·整·個·中·國·對·日·關·係·而·論·，·抗·日·主·戰·的·言·行·，·阻·礙·其·自·身·轉·變·為·和·議·的·主·體·，·對·日·本·如·此·，·對·中·國·內·部·也·是·如·此·。·又·純·粹·投·降·或·屈·服·於·日·本·勢·力·之·下·的·人·物·或·組·織·，·根·本·上·就·不·配·議·和·，·所·以·事·實·上·只·有·對·內·領·導·真·能·救·國·的·和·平·，·對·外·真·能·力·爭·光·榮·有·利·的·和·平·的·領·袖·，·才·能·議·和·！·才·配·主·和·，·就·這·些·事·實·來·看·，·「·張·之·洞·不·配·議·和·，·李·鴻·章·才·配·議·和·」·的·這·類·個·人·權·利·地·位·之·爭·的·烟·幕·，·決·掩·不·住·事·實·的·存·在·！

現在不是胡鬧的時候了，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決不應在抗戰與議和的這樣大事之下，再玩私人權位之爭的把戲，和平救國的大前提既由于客觀的需要



和環境決定了，我們的思想 and 行動的實踐，便應如此：

思想和認識上在和平運動的領袖之下凝結，一變好尚輕燥浮淺，意氣的頹風，養成深沉果毅謀國老成的理智，自變而變國民，自救并救國家民族！

行動和實踐上在和平運動的領袖之下結果，政治軍事方面個人或集團的勢力，在和平的大旗之下，推誠相與，團結一至，以兩年來抗戰的精神和魄力來爭取光榮的和平，保障國家民族來日的建設！

事實擺在眼前，途徑亦極明顯，何去何從，我們當該馬上決擇，至於拋棄民族國家利益的前提，抗戰固然要玩個人權位之爭的把戲，議和也要玩這套把戲，把戲玩不得得意，就要各自四分五裂，稱霸稱王。果爾，則抗戰必亡，和平亦不能不亡。中國便鑄成了左亡右亡的命運。這樣一來，縱然一時利用的一個浮淺的民意獲得了民族英雄或好漢的美號。然而亡國之痛，就在目前。誰實爲之？孰令致之？有識的後代歷史家和我們子孫是決不會蒙蔽而加以寬恕的。

# 從「抗戰」到「主和」

金效胥

現在有兩種不正確的論斷流行着：一是發生於所謂抗戰者羣中，一是發生於讚成和平者羣中。前者說，當初既然主戰，現在又來主和，豈不是自相矛盾？因此他們對於主和的動機，主和的運動者，主和的目的，都加給些惡意的中傷或污蔑。主和者由於現在主張和平，反對繼續戰爭是對的，如因此忽視應戰的苦衷，否認抗戰的一切價值，推而及之不承認這次抗戰具有民族戰爭的性質，那就錯了。兩者都不是持平之論，都是囿於一己的偏見，前者由於未認清抗戰與主和的目的，後者沒了解由抗戰到主和的一貫綫索。固然，這種不清晰的混沌謬見，只是很少的一些人具有，也不得不加以闡述，至於別居用心，信口雌黃者輩又當別論了。

我們姑假定從前的抗戰，現在的主和是兩種劃時期的不同主張，即令如

此，也是須具有絕大的勇氣，超人的智力，而且富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的大智大仁大勇者才能作得出的舉動。決不是私心滔滔，重視個人的權利，地位，名譽者流所敢爲之。因爲以今日之我攻擊往日之我，或否認往日之我，是一種『自我革命』的舉動，是一種『自我反叛』的行動，不是大智者沒有此種見識，不是大勇者不敢有此行動。我們對於此種大智大勇者，欽佩崇拜之不暇，怎肯惡意加以中傷？何況這次由抗戰到主和，並不是前後矛盾，亦不是『主張的自我革命』而是系統一貫，脈絡相通的。

無論戰，無論和，『戰』和『和』本身都不是目的，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宣戰媾和是國家的大權，國家以此大權爲手段達到國家生存獨立的目的。汪先生說：

『國家以保衛其生存獨立爲目的，戰而可達此目的則戰，和而可達此目的則和。』

國家生存獨立的目的，不可變更，手段則可以因時勢不同任意使用，戰而

不可達到目的則和，和而不可則戰，如和戰皆不可達到目的，卽是和戰均不免國家於滅亡，那也只有拚命一戰，樂得自己壯烈犧牲，使敵人也受些創傷。所以汪先生說：

「如果日本定要滅亡中國，我們除了戰下去，更無他法。」

和戰的目的既弄明白，我們再說中日兩國的和戰問題。汪先生素來主張與日本的冤仇宜解不宜結，這是由於中國的處境決定的。中國是個正在興起的國家，而在東亞與兩大強國爲鄰，一是蘇聯，一是日本，中蘇的邦交抗戰以前都在若有若無中，而俄國無論是沙皇統治，無論是斯大林統治對中國都是製造亂源，乘機漁利。中日邦交自甲午戰爭以來，從未好轉過。中國聯俄既勢所難能。如再與日本爲仇，雖與英美和好，要知遠水救不了近火，中國處在鷹鄰虎視的日俄二大強國之間，亦難尋一自存之道。所以總理說：「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汪先生說：

「因爲這樣，中國革命若要成功，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革命之成功，

於日本有利，這不是權謀策略，而是誠意的。」

『十三年間，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那時候對於中日關係是照着以上所述方針進行的。十四年間孫先生逝世，我繼承遺志，主將國民政府，對於以上所述方針，兢兢業業，不敢少變。十七年間便不然了，濟南事件爲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結，中國此時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釋，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復歸於好轉。不幸當時國民政府計不出此，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更惡轉，由此一直至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擔任行政院長，其後又兼外交部長，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來矯正當時「反對直接交涉」的論調，在我手裏先後訂定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我當時的用意，仍是本於冤仇宜解不宜結的觀念，想從局部的暫時的安定，進而謀全國的永久和平。」

所謂「一面抵抗」，因爲汪先生已看透中國不能戰，又不能延頸受戮，所

以須加抵抗。所謂「一面交涉」，因為中日問題一時不能總解決，全面的永久和平不能立刻達到，所以不能不從零星的交涉，局部的和平着手。既不能戰，爲什麼由於七七事變，而引起全面戰爭呢？汪先生引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並加以伸述說：

「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爲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爲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

中國既是被迫而抗戰，所以當時流行的口號是「應戰」不「求戰」。周佛海先生在「回憶與前瞻」中說：

「我當時的意見，以爲在北方，我們決不能再和九一八一一樣的毫無抵抗。因爲在北方如果不堅強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國的決心和實力，就不能

戢當時一部日本軍人的氣燄。我們要以實力表示我們是不可以不戰而屈，我們要以實力使日本知難而退。但是我們要堅持一種政策，就是我們是爲結束戰爭而抗戰，不是爲擴大戰爭而抗戰。」

上引的兩段話將抗戰的實質解釋的明明白白。及至戰爭延續下去，汪先生更是時時想着怎樣可以獲得勝利，怎樣可以覓得和平。汪先生說：

「我自從抗戰發生以後，想到中國不得已而抗戰，時時刻刻想着抗戰怎樣可以持久？怎樣可以獲得勝利？同時也想着怎樣可以覓得和平？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裏，不知說過多少次，等到了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我於去年十二月九日經過一番劇烈辯論之後，知道在會議裏無採納之望，纔於十八日離開重慶，二十九日以此意見公之國民，而促重慶諸人之反省。」

所說十二月七日的劇烈辯論，當時汪先生

「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

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

汪先生爲什麼冒萬難首倡和議呢？因爲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首相近衛聲明，日本已覺悟中國之不可征服，東亞之不可獨霸。日本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爲和平談判之基礎」。否則錯此良機，救國的抗戰，將變成禍國。汪先生說：

「前年七月爲什麼主張抗戰呢？爲的是不如此，不能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如今爲什麼主張議和呢？爲的是如此才可以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

汪先生既認定非和無以救國，乃忍痛離開重慶，發表豔電，以爲號召，並屢次聲明願以在野之身，贊助政府進行停戰議和的交涉。等待了好幾個月沒有結果，救國家救民族是人人有份的，汪先生爲個人良心驅使，各方民衆的催促，開始作救國的奔走。汪先生說：

「我如今告訴各位，我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之後，沒有離河內一步，我當時實在盼望蔣介石肯替國家民族着想，接受我的建議。等



了幾個月，知道這盼望是徒然的，可是國家民族不能不救，於是開始奔走。」

汪先生的豔電大家已看到了，今後汪先生一切行動當根據豔電，貫徹和平主張。

至於怎樣實現和平救國的主張，汪先生已在『怎樣實現和平』一文中給我們以明確的指示。因為『兩國交戰，其回復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戰，第二步是和平談判，第三步是撤兵。』中日的停戰很容易，汪先生說：

『如果蔣介石也贊成和平反共，那麼，全國以內，沒有交戰形勢存在，由全國停戰，而全國和平談判，而全國撤兵，自然容易得多。可是蔣介石既然無望，則先由部份做起，以次及於全國，實為今日救國的唯一方法。』

怎樣由部份的做起呢？汪先生指示我們說：

「只要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明白了和平有希望，而且這和平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破除了蔣介石的欺騙宣傳，第一步

公開的贊成和平，在自己力量所及之地，肅清共產黨的一切陰謀罪惡，保衛地方治安，保衛人民生命自由財產的安全；第二步將贊成和平的聯合起來，公開的要求蔣介石以國家民族爲重，不再做和平的阻礙。這樣和平的實現，在短期間內，必能普遍全國。由和平實現而得回獨立自由，由得回獨立自由而奠定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基礎。復興中國，復興東亞，必由於此。」

部份的做起實現和平的工作，固是前後方的行政當局及一切團體的應有責任，但是我們認爲這還不夠。此外，必須迅速樹立中央領導機關，以爲發號施令的源泉，主持和議，領導各部份共同努力，必可事半功倍。因現在的中央及國民政府在劫持與把持下已不能自由行使職權，我們還希望它什麼？期待它什麼？現在全國民衆受戰爭之蹂躪，俱在水深火熱之中，渴望和平，真如大旱之望雲霓，希望汪先生更進一步迅速建立黨政的中央機關，以領導民衆行動，加速和平的到來。

看了以上的說明，我們總可明白昔日主持抗戰，今日領導和平的行動，前

後不僅毫無矛盾，而且是脈絡一貫，息息相通的。現在我們再引汪先生的話結束認昔主戰今主和爲矛盾的說明。汪先生說：

「我的解答是，當初以爲日本是要滅亡中國的，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滅亡中國，而是要與中國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榮的，所以要謀和平之實現。」

「當初以爲日本要滅亡中國，所以不得已而出於戰，最高目的自然想救中國於滅亡，最低限度不能救國，亦可殉國。如果當初的抗戰是由於這種純粹的不得已的動機，那麼，在今日必然以當初一樣的誠意來謀和平之實現；因爲只要能使中國不致滅亡，則最高目的已達，當初的戰，今日的和。完全是一貫的，沒有一些矛盾。」

「在抗戰期間，我們同志，與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是因爲我們在抗戰開始以前，總是想盡方法不使和平的門終於關閉。」

「我們不問方式，只問條件。只要條件無害於中國之獨立生存，則隨時

準備討論，準備接受。這是我們同志與其他的人不同的地方。這種決心由於不忍中國之滅亡而來的，我們的思想始終一貫，並沒有一些矛盾。」

★

★

★

解釋了認昔主戰今主和爲矛盾者的疑慮，並糾正了他們的錯誤。我們再來說發生於主和者陣容中某些少數人的錯誤見解。一是他們否認抗戰的價值，一是他們忽視這次戰爭具有民族戰爭的意義。

一年多來的中日大戰，中日兩國都有極大的收穫，而且有相互的適切認識，過去的虛驕，誇大等等的心理都消失許多了。中國有一部份不服中國自己是個貧弱國家，又認爲甲午之戰是部份的中國與整個日本作戰，所以中國敗，如現在以整個中國與整個日本作戰，日本未必能勝。再就是自認中國地廣人衆物博，日本國小而不富，長久與日本相持，日本決難得了。實際上日本處處進逼，逼到中國退無可退，到了最後關頭，最後關頭既到，大家只有拚命犧牲。還有一些人，相信共產黨的欺騙宣傳，認爲中國如果與日本開戰，蘇聯定援助

中國抵抗，共產黨亦必放棄其殺人放火的勾當從事民族戰爭。這一些不切實際的打算全爲年餘來的血戰打破了。一般人知道了日本國力之強，中國決不是敵手，久戰日本免不了困難，中國更難支持。蘇聯是使中日兩國長期相打，同歸於盡爲目的，中國共產黨更是趁火打劫的好手，他們沒有祖國，更無所爲中國民族。戰後的慘酷現實破滅了戰前的幻想，大家痛切的感到支持戰爭之困難，戰已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生存，於是希望棄戰言和，這是中國的收穫。

日本也是如此。甲午戰爭以後，日本以征服中國爲標的，認中國是它的囊中物，整取零割，任所欲爲。九一八以後日本一部份軍人的野心更熾，他們以爲中國可以不戰而屈。蘆溝橋事變，想重收不戰而屈的效果，中國被迫抗戰了，日本乃想以速戰速決的戰略結束中日戰爭。速戰速決已不能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戰爭延長下去，日本認識了中國民族已非甲午戰時的中國民族可比，感覺到結束戰爭的困難了。戰爭既不能結束戰爭，只有棄戰言和，這是日本的覺悟，這是日本的收穫。

中日兩方皆自知困難，亦互知困難，故皆能誠意的棄戰言和。中日在南京陷落以前，曾因德國調停一度磋商和議，日本所提條件較苛，及至戰爭又進行一年，徐州，廣州，武漢都丟了，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反提出較前爲寬大的條件，這是日方覺悟中國之不可征服的明證。汪先生說：

「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尙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爲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爲和平談判之基礎。……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爲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爭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爲不可再失之良機矣。」

日本如果不是因深悉中國之不可征服，爲什麼在戰爭的形式勝利更大時降格言和呢？汪先生說：

「不過二十個月的苦戰，中國人固然了解日本作戰力之強，日本人亦了解中國不是可以隨便欺負的。」

由於軍隊和人民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識，使戰爭能夠支持這樣久，使日本知難而退，使日本翻然改圖，棄戰言和，汪先生說：

「自從抗戰開始以來，人民出錢出力，受盡流離顛沛，沒半句怨言，將士奮勇犧牲，前仆後繼，絕無反顧，這是中華民族的元氣，是中華民國生存獨立之所託，日本所以提出和平條件，未嘗不是看重這一點，知道中國是不可以滅亡的。此次和平運動，如果成功。實實在在是拜一般抗戰民衆及軍士之賜。」

中日兩國由於此次戰爭，皆自己認識了自己，也了解對方，中國了解日本國力之強，日本了解中國民族意識之不可侮，所以汪先生說：

「打了一年半的仗，日本的國力，中國的民族意識，都已充分表現出來，日本既然聲明，對中國沒有侵略的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爲什麼不也伸出手來，應如兄弟兩個廝打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這是何等又悲痛而又歡喜的事。」

不打成相識，在中日戰爭中獲得明證。周佛海先生在『中國國民黨過去  
的功罪與今後的地位』一文中也說：

『當時的抗戰，還有更積極，更偉大的意義和價值，那便是從這次抗戰  
中，打出了中日兩國的澈底覺悟，真正了解，和誠意合作，把甲午以後的一  
切流水賬，告一個總清算。』

若在戰前，使日本國民承認中國民族意識的堅強，不可能；使中國民族承  
認日本的國力不會消耗到和中國不能打仗的程度，也不可能。現在不僅有這個  
可能，而且是互相承認的事實，是什麼收穫的呢？一年多來的血戰打出來的，  
能說抗戰全沒有意義？能說抗戰沒有收穫？抗戰有沒有意義，有沒有價值，就  
看抗戰所生的效果如何。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獨立生存，抗戰的結果，已  
使日本伸出和平之手，已使中國有合於正義的和平之門可尋，國家之生存獨立  
也可賴以保持，就是抗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我們不能把抗戰的價值估計過  
低，亦不能估計過高，過低將使我們無所憑藉，過高將使我們由犧牲得來的代



價完全糟蹋。要說抗戰一年來，已可使日本停戰言和，抗戰延長下去，豈不可使日本撤兵退走了嗎？這樣將是白白送掉過去抗戰得來的效果，重慶人就是如此想。實際上中國民族意識無論如何堅強，尙沒有達到使日本能由中國潰退的程度。

至於否認這次抗戰爲民族戰爭者，更是有些貶抑自己。實際上這次中國空前的戰爭，真做到『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一致參加抗戰了。而且因爲保衛國家民族的生存，被迫而出於抗戰，所以人皆抱定必死之心，在物質上盡其所有，在人力上盡其所能，甯使人與地皆成灰燼，亦不辭與侵我者周旋，這種精神，這種勇氣，誠足驚天地而動鬼神。日本由於此點才肯與我們釋兵言和，我們也仗恃此點才能與日本平等言和。不然，國土已失了大半，國將不國，我們依恃什麼與日本言和呢？只是依恃全國民衆爲後盾，依恃全民族的可侮的精神爲後盾。抗戰賴有全民族的支持，始到如今，現在全民族的大多數都渴望和平了，我們欲獲得光榮的平等和平，也只有依靠全民族的力量才能達

目的的，大家不要自丟了「竹槓」，那時再想和平也不能了。

（轉載三民周刊）

# 關於和戰問題的言行心理

中華日報社評

凡是箇人，對於一件不論大小的事情，在內心必定先有箇主意，然後拿言語文字來對外發表，再跟上去就開始行動，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正像心中要約會一箇朋友，定了主意，就寫信去約他，再行親自出門到他那裏一樣，這三件事是互相連繫，逐步推行，決不能差錯一點，何況矛盾。

小事如此，大事可知，箇人的私事如此，國家的公事可知，可是我們國民，尤其在這危疑震撼，一髮千鈞的時候，自己試來檢討一下，我們對於小事的言行心理，照樣的維持連繫；可是對於國家大事，我們是怎麼樣？

現在國家的當前大事，說得抽象一點，是存亡問題，說得具體一點，便是和戰問題。這是大家都知道。我們全體國民，那一箇不愛國，那一箇不想替國家謀生存，自己身受了無辜的莫大損失，姑且不要說他，可是對整箇國家的

莫大損失，以至全民族的生存前途，我們豈能不認真研究一下。

研究的結果，我們內心，可以認定戰事之絕難取勝，和平之並非亡國，只要大家對於和平的工作，格外謹慎，格外努力；馬上回頭，立時設法，國家雖在『金甌破碎』的時候，還未亡完；社會雖在『牽蘿補屋』的時候，還未到總崩潰的一天，倘然在和平的途徑上去想箇辦法，國家還有復興之日，否則戰事天天擴大，土地天天損失，人民由離散而消亡，經濟由枯竭而崩潰，這是必然的趨勢；到了那天，國家是亡定了，並且也來不及再救。這種心理，差不多早已十分普遍，也實在因為事實擺在面前，雖不細加研究，任何人都可以推想得到的。

可是內心的意思，雖然如此，到了言語文字方面，大家便變了箇面目了。一到了行動方面，更是不能與內心連繫了。現在的言語文字，或者是不願多管，或者是接受了共黨的虛偽宣傳，或者是因為恐怖的壓迫，或者是因為社會上還在混沌之中，不敢遽露頭角，於是消極的人，自己雖明瞭一切，只是緘口

不說，就說也只來兩句風涼話，積極的人，沒有辦法，還要跟着唱兩句高調。我碰見無數的人，在大庭廣衆之間，沒有一箇不主戰，而在知己密室談話的中間，又沒有一箇不主和，我曾經問過他們，爲甚麼當著大衆要說『違心之論』他們只說環境之下，只可如此。我想環境是大家國民相互造成的，不明瞭的，不必去責備他，既然明瞭，還不肯率直的說出來，未免太對不住我們的國家了。

關於行動方面，大家因爲同一上說的理由，也常常是跟言語文字一樣的違心。內心贊助著和平的理論，外表卻不能不裝出戰士的精神。明知和平運動，在目前是救國的惟一途徑，可是一向都沒有敢去做和平運動。自己肯枉擲祖宗的邱墓田園於炮火摧殘之下，可是並不敢犧牲箇人，出來發表良心上的主張，做些挽救危亡，保全國家民族的工作。我們的先哲，叫我們『行其心之所安』可是我們最近所行的，大都是『心之所不安。』這樣國家還有救麼？民族還有前途麼？知道救國的方法而不去運用，可不是就要負起亡國的責任麼？試問大家願意不願意？

國民內心上認定戰爭的沒有辦法，和平的急應進行，實在說起來，已經有不少時候了。但是大家已經因為『違心之論』『行其心之所不安』的原故，就誤了不少很好的機會，換句話說，也就是就誤了不少救亡圖存的機會。一直到了現在，和平的門，是算已經打開了。和平的基本原則，也已經為大家所知道了。可是和平的事業，還正在著手的時候，跟著和平下來，還更有無數的復興事業，這都是我們任何國民的責任，我們既然是愛國的國民，就應當共盡救國的責任。我們要盡救國的責任，第一就要先來檢討自身；檢討自身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要『行其心之所安』『言行相符』千萬不可再像先前一樣，自己明白，卻不肯告訴他人，或者去推進自己心理上的信念工作。

以前大家的錯誤，是沒有法子去補救的了，可是從今日起，埋頭努力，還趕得上一箇最後的機會。我們國民，趕快把握著這個機會，將內心的主張，盡量拿出來，個人的方案，盡量拿出來，貢獻國家罷，要知道再錯過了這個機會，可真是萬劫不復的。

# 從抗戰建國到和平建國

中華日報社評

和戰之於次殖民地的中國，是一盾的兩面。牠的共通目標，是保障民族國家的獨立生存和領土行政的完整自主。二者之間，只有方式的不同，沒有本質的差別。戰是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採取犧牲的途徑，用血肉來達到上述的目標，而和則是採取外交的方式，俾犧牲血肉的成果不致流產，而使上述目標同樣的達到。中國是一個弱國，一貫的期望是和平。和平未絕望時應力求維持和平，和平被破壞時應力求恢復和平，而戰爭則不過是一種應付變態的不得已手段。所以「和」「戰」的本身沒有是非，只有因時間的推移所引起的客觀條件的變化，才能決定和戰本身的價值。

中日戰爭已經兩年多了。由於中國的英勇抗戰所表現的民族意識和力量，不但使世界震驚，即對方亦不得不致其欽敬，近衛廿二日談話有云：「已感覺

中國的更生力量與建設氣運在逐漸升起」。同時，中國亦從戰爭的經驗，知道日本是不可輕敵的。這樣，兩國已由力的對抗走到互相認識，互相尊重，而兩國釋嫌言和的交點亦即在此。

國民黨於此，繼「抗戰建國」的口號而提出「和平建國」的口號，這完全是準確的。當時是只有抗戰，纔能保得住建國的基地，現在是只有和平，纔能繼續完成建國的工程。在「抗戰建國」的時候，我們要的是在抗戰中爭取國家民族的命脈，在抗戰中發展民權而且在抗戰中樹立合理的經濟制度。可是蔣介石沒有這樣做，他反而在抗戰中把國家民族的命脈斷送給蘇聯，在抗戰中加緊其軍事獨裁，並且在抗戰中更腐化經濟制度。過去，當抗戰是必要的時候，我們主張強化抗戰，以與蔣的利用抗戰鬥爭；現在到了和平是必要的時候，我們主張實現和平，以與蔣的阻礙和平鬥爭。我們並且鄭重指出，依賴國際以抗戰與依賴國際以和平，都是要不得的。我們更同樣鄭重的指出，運用軍事獨裁以抗戰與運用秘密外交以和平，都是要不得的。我們過去主張抗戰對外必須自



主，對內必須民主。現在我們主張和平對外必須自主，對內必須民主。所以我們過去的提出『抗戰建國』的口號，與現在提出『和平建國』的口號，其根本認識是一致的，其努力目標也是一致的。

現在我們的主張已普及全國，已到了行動的時候。我們警告蔣介石及其從屬，在顧全國家民族的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個人的權位之見應該泯滅。我們盼望各黨派，在顧全國家民族的利益的大前提之下，派系之爭應當泯滅，共產黨以外的黨派，應當是都能明瞭國民黨領導和平運動的誠意而與之合作。我們期待軍人能本其對抗戰救亡的認識，進而為和平圖存的認識，以抗戰的勇氣與犧牲，為實現和平而努力。我們請求民衆要以理智代替感情，一起奮起，給予和平運動以行動的支持！

# 論和戰

中國公論社論

## 一

中日事變，已逾兩年，迄今此種閱牆的戰禍，業已形成偕亡的危機。瞻念前途，令人不寒而慄！

中日兩大民族如果不願偕亡，自應立即停戰。然欲停戰，則中國須有與日本媾和之心，而日本尤須與中國以可和之道。

茲請本此意旨，申論中日和戰問題，以促中日雙方的澈底覺悟，而謀此次事變的合理解決。

此次事變的所以發生，周佛海氏在其「回憶與前瞻」一文內曾有說明，略謂：

「這次的中日戰爭，真是冤枉極了。因為是陰錯陽差的打起來，就不能

不糊裏糊塗的打下去。在蘆溝橋事變初起的時候，兩國的當局，何嘗沒有就地解決的意思；何嘗不採取不擴大的方針。但是雖然都有不擴大之心，而都處於不得不擴大之勢。在日本方面，當時在華的軍人，是氣燄萬丈的。他們以爲中國仍舊是可以不戰而屈的，仍舊是可以威脅成功的。所以儘管東京方面，聲明不擴大方針，而平津方面，則儘量採取擴大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就是當時的當地軍人，也沒有把當時局部衝突，演成現在這樣全面的戰爭的意思。在中國方面，當時的現象，更是可以痛心，朝野上下的調子，沒有不高唱入雲的。但是調子唱得很高的人，除着頭腦極簡單的糊塗蟲以外，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決不能僥倖成功的道理。這些道理，共產黨，桂系及當時不滿意中央的人，沒有不知道的，蔣先生尤其比任何人要清楚，大家都知道戰爭不能擴大，不應繼續，而偏偏都高唱持久的全面戰爭。這樣悲慘的矛盾，決不是將來的歷史家所能了解的。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份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爲要倒蔣，所以高唱持

久的全面戰爭。蔣先生是絕頂聰敏的。這種把戲，那裏瞞得過他？所以他們的調子唱得高，他的調子唱得更高。在他的意思，以爲他的調子一高，一方面可以壓服反對的人，使他們失掉了倒蔣的理由，同時對日本也表示自己的決心，使日本知道這次不是可以威脅成功，而促成日本的反省，以提早事件的解決。他的用心，實在很苦。不過他這種用心和辦法，不僅不容易獲得他預期的結果，反足以作繭自縛，逼迫他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我在蘆山談話會的席上，聽見他發表關於蘆溝橋事件的意見以後，立即就發生這種感想。當時我就對朋友說，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適足燒身，前途是未可樂觀的。因爲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着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得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得深。同時，蔣先生本想以高調威脅日本，而日本當時在華的軍人，也不肯在蔣先生高調之下示弱。於是這邊調子越高。那邊態度越強。但是調子高是假的，態度強也是假的。無論調子如何高，態度如何強，當時都沒有從事全面長期的戰爭的

決心和準備。不過一方面沒有想到高的調子雖然是假的，將來如何可以變低；別方面也沒有想到強硬的態度雖然是假的，將來如何可以化軟。於是兩方面在假的空氣之下，竟演成了真的空前的慘劇！

周氏此種闡釋，對於戰爭初起時的雙方心理，觀察極爲縝密：然而中日戰爭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是。此次事變，自有其社會的契機，我們必須予以深刻分析，始能把握中日問題的癥結。

惟能把握中日問題的癥結，而後始能探求中日事件的出路！

## 二

中國近年，因受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社會經濟基礎起了激劇的破壞，業已淪爲半殖民地的國家。

在中國日趨於殖民地化的途程中，英國利用中國沿海商業社會爲基礎，以建立其對華關係。蘇聯亦利用中國內地農村社會爲基礎，以施行其對華政策。

年來中國國民黨的社會經濟基礎，大體建築於沿海商業社會。中國共產黨的社會經濟基礎，大體建築於內地農村社會。

因此國民黨政權，不免為英國所操縱；而共產黨勢力，則純為蘇聯所把握。

年來中國沿海商業社會既為英國所操縱，而內地農村社會復為蘇聯所把握，因此在中國國民黨未能脫離英國的束縛以前，在中國共產黨未能覺悟蘇聯的陰謀以前，國共兩黨勢力的成長，即英蘇兩國在華勢力的增強。

英蘇兩國在華勢力的增強，當然予日本以最大威脅，在此種情形下，所以年來中日關係愈趨愈惡，而戰禍的發生，乃屬無可倖免！

事變以前，國共兩黨原為死敵，十年內戰，舉世所知。此其原因，蓋由英國為資本主義國家，蘇聯為共產主義國家，其社會經濟基礎，根本矛盾，從而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自亦衝突。

國共兩黨勢力的盛衰，即英蘇兩國在華勢力的消長。

惟其如此，故事變不能不發生。亦惟其如此，故事變發生以後英蘇兩國乃聯合以對日！

於是英國支持抗戰，蘇聯也支持抗戰。英國主要的是支持國民黨，蘇聯主要的是支持共產黨。

本來具有矛盾的英蘇兩國，至此既聯合以對日，從而本來互相衝突的國共兩黨，至此亦合作以抗戰！

中日兩國成了悲劇的主角！英蘇兩國却爲幕後的導演！

## 三

英蘇兩國，雖同樣的指導抗戰，支持抗戰；但在英國，則爲支持國民黨，斷求維持國民黨的政權，以確保其在既得的權益。而在蘇聯，則爲支持共產黨，意在助長共產黨的勢力，以遂其赤化中國的陰謀。

英國以維持現狀爲主旨，蘇聯以推翻現狀爲得計。

英蘇兩國支持抗戰的目的既異，國共兩黨的抗戰意旨亦殊。

國民黨之所以抗戰，是因爲當時審度國內情勢，不抗戰則其統治地位發生動搖，故不得不抗戰以維持其政權。

共產黨之所以抗戰，是因爲當時審度國內情勢，不抗戰則其共產勢力無法維持，故不能不抗戰以培植其力量。

國民黨抗戰的初衷，是以攘外求安內。  
共產黨抗戰的本意，是以抗日而圖存。

國民黨既以攘外求安內，故戰釁雖開，亦望事變不致擴大。而戰禍延續至今，殊出國民黨意料以外！

共產黨既以抗日而圖存，故戰釁既開，尤望事變能以延長。而戰爭擴大至此，自在共產黨預計之中。

英蘇兩國支持抗戰的目的既異，國共兩黨從事抗戰的意旨又殊，故在抗日合作陣線的演進中，國民黨對共產黨始終具有戒心，共產黨對國民黨始終懷有



陰謀。蔣介石氏在軍事上的防共佈置，雖具苦心孤詣，然而大勢所趨，終究事與願違，戰禍的延續日益長，戰爭破壞日益劇，人民的痛苦日益深，而共禍的披猖日益烈！

#### 四

乃·是·爲·了·執·行·第·三·國·際·的·決·議·，·爲·了·實·行·赤·化·的·政·策·。

自·事·變·迄·今·，·最·主·張·抗·戰·者·，·莫·過·於·共·產·黨·，·而·其·所·以·主·張·抗·戰·的·原·因·，

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決議半殖民地之中國，適用民族統一陣線的反帝鬪爭。當時國際共產黨書記長第米托洛夫及中國共產黨代表陳紹禹，莫不力主民族統一陣線有結成的必要，大會乃根據第米托洛夫的報告，而有如次的決議：

『在中國爲蘇維埃運動的擴展與紅軍戰鬥力的強化起見，不能不與反帝人民運動的展開相結合。此種運動，乃對帝國主義的壓迫者，尤其是對其御用的中國人，不得不在武裝人民之民族革命戰爭的口號下，實施起來。中國

蘇維埃在全中國民族的解放鬪爭上，宜爲團結的中心。」

據此，則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促成國共合作抗日陣線，不過爲了「蘇維埃運動的擴展與紅軍戰鬪力的強化」而已！

中國共產黨之指導的論客陳紹禹氏，對於中國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結成民族統一陣線的基本意義，曾經闡釋：「國際共產黨，準備於第七次大會時詳細分析國際情勢。中國共產黨，縝密研討反帝統一陣線問題的結果，深感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在此條件下，相信只有總動員偉大的中國民衆，實行決定的英勇抗日鬥爭，除此以外，別無救國的方法。同時并相信共產黨在民族統一陣線以外，別無總動員全國民衆的方法」。

中國共產黨雖然放棄了階級鬪爭，但並未放棄其階級立場。其居心，是將合作抗日戰線成爲其所利用的外圍。祇要抗日進行，其陰謀即可施展。

因此，蘇聯對於抗戰最煽動，而共黨對於抗戰最堅持！

## 五

事變延長，蘇聯在華的共產勢力必將日益擴展。國民黨對此固然具有戒心，即英國亦何嘗見不及此？以英國與國民黨的利害關係而言，處此情勢，自必運用美法等民主國家，以強化其對於國民黨的支持。如此由於英蘇兩國的支持與操縱，事變愈難解決。假使中日兩大民族不能澈底覺悟，以真誠合作來抵制英蘇的陰謀，勢必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中日當時雖戰其所不得不戰，而至今已應和其所不可不和！然而為什麼還要戰爭？為什麼還不平？

英蘇明明對中國具有陰謀，而日本對中國又在強調親善，中國為什麼不與日本言和？這是中國應當反省的！

中國何嘗不知英蘇具有陰謀？何嘗不曾聽見日本高唱親善？然而中國為什麼還要抗戰？這也是日本應當反省的！

事變以來，中國民衆祇見到淪陷區域內日本人士的力量，未見到抗日陣營內英蘇人士的陰狠！於是便把英蘇的陰謀忽略，這正暴露了中國民衆知識的淺

薄與幼稚！

然而，日本爲什麼不應該用事實來證明言論，爲什麼不蘄求轉變中國民衆的心理！

中國上下最低限度的希求，祇是維持國家民族的生存！爲了生存，中國可以戰爭，爲了生存，中國也可以和平。

中國民族絕不和生存反對，因而也絕不和真的和平反對！

中國上下所希望真的和平，是「和平救國」！

救國而不和平，則「國」不能「救」；和平而不救國，則「和」亦不「平」！

汪先生於七月二十二日在中華日報發表「兩種懷疑心理之解釋」一文，曾謂「去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頭曾說：『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之最終希望仍在和平，惟吾人之所謂和平，乃合於正義之和平，必如是，然後對內得以自立，對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爲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又說：『以此之故，中國對於日本，既明示以抗戰之目的，更本必死

之決心，盡可能之努力，以赴此目的，必使日本瞭然於中國之目的，知中國終不以暴力屈服，幡然變計，放棄其侵略主義，更與中國謀合於正義之和平，然後中日共存之希望始達，太平洋之危機始息，世界和平始得到真實之保障」。由此可見中國對於和平之希望及其對和平之基本條件，由此可知所謂『講和即漢奸』，所謂『抗戰到底』，所謂『中途妥協即是滅亡』，完全是共產黨人一方面的議論。」

方今中國除共產黨人別有用心外，殆無不渴望和平。然而所謂和平，終有其「基本條件」：

我們敢斷言，和平而能救國，則雖抗日陣營中的人士，亦必反對戰爭；和平而不能救國，則雖淪陷區域內的民衆，亦不敢望和平！

最近自汪先生廣播「如何實現和平」以後，和平救國運動即將有新的開展，此為中日和戰的重大關鍵，亦即中日存亡的緊要關頭，中日兩大民族，如果真愛祖國，愛東亞，就應澈底覺悟，力促實現正義的和平。否則「和」不可

期，「戰」將延續，戰爭延續的結果，中日兩大民族必將日趨於偕亡，而其所以致於偕亡者，並非天命之已定，實由人謀之未臧！

最後，我們願向中日兩大民族大聲呼籲：  
現在是中日和戰的重大關鍵，也是中日存亡的緊要關頭，中國須有與日本媾和之心，而日本尤須予中國以可和之道！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5864B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